

# 武汉合唱团及其南洋演赈活动历史考察

○ 戴俊超 吴 蓉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实施侵略政策,我国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渐次形成高潮。武汉合唱团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高潮时期所产生的一个较具影响的抗战歌咏团体,曾远赴南洋开展了历时一年半之久的演赈活动,在南洋侨胞及友邦人士的心目中,树立了我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们在国难深重之下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南洋爱国侨胞心系祖国抗战、踊跃捐输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珍视、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 抗战歌咏运动; 武汉合唱团; 南洋演赈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923(2022)05-0116-08

**收稿日期:** 2021-12-16

**DOI:** 10.13812/j.cnki.cn11-1379/j.2022.05.015

**作者简介:** 戴俊超(1963—),男,汉族,博士,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吴 蓉(1974—),女,汉族,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歌咏活动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源自学堂乐歌带来的新型歌唱形式。“近采日本、远效西欧”的学堂乐歌,引入了集体歌唱形式,因其包含富国强兵的思想内涵与新音乐特质,由学堂推及社会,大受民众欢迎,一时蔚为新潮。学堂乐歌不仅是我国新音乐之肇始,而且使“群众集体歌唱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与发展,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sup>①</sup>。而歌咏活动对于我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却是在1931—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产生的。抗战期间,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激荡,抗战文艺运动方兴未艾,抗战歌咏运动则成为抗战文艺麾下的“高亮点”活动。

成立于武汉会战前夕的武汉合唱团,原本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由于较好地兼顾了艺术与宣传的关系,在为数众多的歌咏团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向国际社会推介抗战歌曲的模范。当时,武汉合唱团除了在社会上做宣传之外,还多次承担招待国际友邦人士的外宣活动。在武汉沦陷前夕,立志报国的武汉合唱团的

28名团员,决定抛家舍业,赴南洋开展演赈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武汉合唱团在武汉会战时期以及南洋演赈的活动,除了当时留存的宣传资料和相关回忆史料外,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比较缺乏。以汪毓和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历次版本为例:在1994年版中尚无对“武汉合唱团”的介绍,在2002年版以及2009年版中,仅在介绍夏之秋的附注中有“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武汉抗战工作团音乐组长及武汉合唱团指挥”的简要说明<sup>②</sup>。在陈先炳主编的《夏之秋纪念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特刊,1994年5月出版)中,虽则有了武汉合唱团及其南洋演赈的介绍,但大多为回忆性质史料。在叶其思《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中,汇编了大量且零碎的武汉合唱团在南洋演赈的新闻报道。武汉合唱团

<sup>①</sup>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sup>②</sup>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成立的情况如何，武汉合唱团的特色为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奔赴南洋演赈，在南洋演赈的过程与效果若何？这些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回味这一段往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在新时代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乡谊作用等方面，具有鉴往知今的历史意义。

### 一、在“武汉会战”前后的演出活动

1937年冬，随着最大城市上海及首都南京的相继沦陷，中国抗战进入了“武汉会战”期。此时，全国文艺界人士齐聚武汉，掀起轰轰烈烈的武汉抗战文艺运动。歌咏方面，冼星海联络吕驥、贺绿汀等音乐界人士，于1938年1月17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组毕业生江定仙、刘雪庵等，曾与武昌文华中学音乐教师黄椒衍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武汉合唱团”的组织。在江定仙等人的组织下，武汉合唱团“却有蓬勃的气象”，但由于“江君为了其他的原因，不得不离开武汉”，便将合唱团的指挥工作托付给在“国立音专”求学暂回武汉避难的夏之秋、周小燕等接办。<sup>③</sup>此时，夏之秋与周小燕回到武汉后，也曾先后在汉口和武昌组织了两支歌咏队参与宣传活动。他们接任武汉合唱团指挥后，将这两支歌咏队与武汉合唱团合并起来。实力大增的武汉合唱团，一举成为武汉文艺救亡运动期间公认为水平最高的歌咏团体。<sup>④</sup>其不同之处是，武汉合唱团大多以混声四部合唱的形式演唱抗战歌曲。

武汉合唱团的活动，引起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执行委员冼星海的关注。1938年3月5日，为救助日军飞机空袭武汉造成的一批难民，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汉口俄国总会俱乐部举行联合演奏大会，冼星海特邀武汉合唱团承担其主要节目的演出。<sup>⑤</sup>据资料分析，这次演奏大会的节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武汉合唱团48

人组成的合唱，曲目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第二部分为独奏与独唱节目，计有王人艺、张舍之的小提琴重奏，巫一舟的钢琴独奏，杜庭修、田鸣恩的男声独唱，周小燕的女声独唱等；最后由武汉合唱团演唱合唱《伏尔加河船夫曲》《旗正飘飘》。演奏大会获得了一千多元赈款的良好成绩。<sup>⑥</sup>之后，武汉合唱团开始健全组织：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干事分担各种工作，开始了在社会上的多次公演。合唱团的演出，还引起了时任国民外交协会总干事钟可托先生的注意，他推荐该团参加招待外宾的数次演出，组织该团到广播电台录音并制成唱片，分寄世界各国以资宣传。此时的武汉合唱团已发展至70多人，“常常在深夜十二时后，还在水银灯下试唱”。可惜的是，由于各人职业的关系，往往不能全数参加歌唱活动。<sup>⑦</sup>

随着战局变化，武汉危在旦夕，而武汉合唱团仍然还是松散型的组织，在国难日深之下难以发挥效力。于是，合唱团骨干成员陈仁炳<sup>⑧</sup>建议赴海外演赈，以雄壮歌声激起敌忾，以募捐支援民族解放大业。1938年7月31日晚，他们相约“正式组建武汉合唱团”，其团员都“辞去职业、告别家庭，自筹经费，赴海外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当场报名者达26人。由于周小燕将赴法国留学，夏之秋便设法联络毕业于北平大学音乐系的女高音周保灵加入，同时邀请毕业于“国立音专”

<sup>③</sup> 费黑罗：《介绍武汉合唱团》，《战歌》，1938年4月15日第1卷，第7期，第10-11页。

<sup>④</sup> 杨胜红、袁少运：《一片歌从武汉来——抗战烽火中组建的武汉合唱团》，《长江日报》，2008年11月4日，第1版。

<sup>⑤</sup> 李崧：《抗战初期，冼星海在武汉》，《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39页。

<sup>⑥</sup> 《武汉合唱团昨举行救济难民演奏大会》，《新华日报》，1938年3月6日，第2版。

<sup>⑦</sup> 《武汉合唱团六人抵星，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对记者谈话》（193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转自叶奇思：《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以下简称《赤子丹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sup>⑧</sup> 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1928年入上海沪江大学，1936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钢琴组的潘莲雅女士担任钢琴伴奏,先后加入者共达28人。合唱团出发前,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先是推举正、副团长各一人,分由夏之秋与黄椒衍担任;另设立总领队,以监督工作执行情况,由陈仁炳担任。其次是设立了宣传组与总务组,宣传组内设音乐股、戏剧股、演展股,总务组内会计股、文书股、事务股,各组及各股负责人分由团员兼任。合唱团在随后两个月的护照办理期中,白天排练话剧,晚上练习歌唱,并募集大批的书报、照片等以备宣传之需。<sup>⑨</sup>

赴南洋的筹备工作历经两个月,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亦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其间,陈仁炳与夏之秋、黄椒衍曾专访中共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了解中共的抗战主张与政策。9月15日,主管抗战文艺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会见合唱团全体成员,赠送锦旗,以壮行程。<sup>⑩</sup>合唱团离开武汉前,董显光又主持召开由500余人参加的欢送大会。1938年9月30日,满怀救国热忱的武汉合唱团,由陈仁炳、夏之秋率领从汉口出发,开启了他们“慷慨悲歌”的万里之行。

## 二、在新加坡的演赈活动

1938年12月18日晚,到达南洋的武汉合唱团于新加坡大世界游乐场太平洋戏院举行了试演,观众为新加坡各侨团、学校的筹赈会工作人员,还特邀当时驻新加坡领事馆总领事高凌百<sup>⑪</sup>前往观看。试演曲目14首:1.青天白日满地红,2.救国歌,3.满江红,4.募寒衣,5.焦土抗战,6.打回东北去,7.赶走敌人,8.青年战歌,9.游击队歌,10.松花江上,11.玉门出塞,12.长城谣,13.保家乡,14.歌八百壮士。此次试演,也为其后的演出奠定了一种“演唱、演说、演剧”的程式:1.在演出前,在侨领中公推一位主席主持演出仪式,2.合唱团演唱,3.团员演说,4.演出救亡话剧。

在新加坡期间,合唱团一共出演67场:其中,专演话剧6场,歌唱演出3场,试演或联谊演出5

场。以下为合唱团在新加坡的演出场次统计:

1938年12月18日,大世界太平洋戏院(试演1场,演唱歌曲14首);1938年12月24日至1939年1月3日,大世界太平洋戏院(11场,演唱歌曲16至20首不等);1月3日,首都戏院(1场,演唱歌曲18首);1月15日至21日,新世界日光戏院(7场,演唱歌曲16至28首);1月21日,快乐世界舞厅(1场,合唱歌曲5首);1月23日,新加坡马来西亚广播播音(1场,歌曲12首);1月25日至31日,大世界太平洋戏院(7场,演唱歌曲18首);2月3日至6日,域多利亞纪念堂(3场,演唱歌曲18首),2月8日至17日,快乐世界体育场(7场,演唱歌曲20首);2月20日,春节海上游艺筹赈(1场,演唱歌曲23首);2月25日至3月5日,大世界太平洋戏院(9场,演唱歌曲20至26首);3月8日至22日,源顺街天福宫(11场,演唱歌曲18至22首);3月25日至4月2日,大世界太平洋戏院(6场,话剧专场);4月5日,域多利亞纪念堂(1场,演唱歌曲28首)。<sup>⑫</sup>

在新加坡演唱的曲目,从试演时的14首,逐步增加至48首。其中,1938年12月24日至1939年1月3日晚,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连续11场演唱,曲目与试演基本相同。随着团长夏之秋、钢琴伴奏潘莲雅及女高音周保灵的加入,从12月30日起,逐步加入曲目有:《抗敌歌》《抗战到底》《青年战歌》《女青年战歌》《热血歌》《保卫中华》《流亡三部曲》《上前线》《背着枪》《日本的兄弟》等。

1939年1月15日至21日晚,合唱团在新世界日

<sup>⑨</sup>陈建宁等:《武汉合唱团为赴海外宣传发动募捐情形史料一辑》,《民国档案》,2017年,第1期,第29-35页。

<sup>⑩</sup>《武汉合唱团在纪念堂演唱最后一晚,夏之秋致词述合唱团南来使命》(1939年2月7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167页。

<sup>⑪</sup>高凌百,1900年生于江苏江阴,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等要职,1936年9月出任国民政府派驻新加坡总领事。

<sup>⑫</sup>据叶奇思《赤子丹心》,第47-266页内容整理而成。其中因合唱团间或停演休息,其演出场次与日期区间的天数可能稍有不同。

光戏院连演7场，逐步加入歌唱曲目有：《安全土》《旗正飘飘》《秋风凉》《全国总动员》《前进》《莫做汉奸》等。1月23日，合唱团应邀在新加坡广播台播音，演唱了12首歌曲：《上操歌》《青年战歌》《热血歌》《保卫中华》《玉门出塞》《满江红》《玫瑰三愿》《巾帼英雄》《旗正飘飘》《长城谣》《松花江上》《歌八百壮士》。其中，《上操歌》《玫瑰三愿》《巾帼英雄》为新曲目。1月25日至30日又连演7场，再加入《淮河船夫曲》《镰刀歌》《锄头歌》等歌曲。1月25日至31日，重返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演唱，新添的曲目有：《冲锋号》《认清敌人》《新生命》《奋起救国》《游击进行曲》等。2月25日至3月5日，合唱团再次到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演出期时，由于大多数观众对于抗战歌曲日渐熟悉，当唱到《保家乡》一曲时，“夏指导别出心裁，将该歌之后六节改由全体听众齐唱，再则男唱一遍，女唱一遍，集千余听众之歌声，作融洽一片之怒吼。所谓歌声到处，救亡精神寄乎其间，歌咏之感人实大哉！”<sup>⑬</sup>

正式演出之外，合唱团还在多种联谊活动中演唱。如，1939年2月8日，合唱团男女团员在快乐世界体育场分别与新加坡男子联队、南洋女中队举行男女篮球慈善赛。比赛结束后，合唱团演唱了《抗敌歌》《满江红》《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歌曲，最后与全场观众一起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场弥漫激愤的热情，雄壮的歌声，震动空间，有如万军怒发”。<sup>⑭</sup>2月21日，为庆祝农历春节，星华筹赈会<sup>⑮</sup>邀请合唱团团员乘游轮举办“海上游艺筹赈”，合唱团在游轮上演唱了22首抗战歌曲。<sup>⑯</sup>

1939年3月7日，在星华筹赈会的资助下，武汉合唱团出版了一本名为《民族呼声》的歌集，收录武汉合唱团常备演唱曲目48首。内页有高总领事题字、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序文以及主编夏之秋の説明，最后还有团员戴天道的后记，是为我国抗战期间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抗战歌曲集。<sup>⑰</sup>夏之秋在说明中说：“在没有离

开武汉之前，就想编写一本比较丰富新颖而合用的民众歌咏集，当时因交通不便，纸价飞涨，和缺乏印刷机等重重困难而作罢。”陈嘉庚在序言中，对武汉合唱团赞誉溢于言表，“歌声入耳，闻所未闻，但觉耳际有如万马奔腾，怒潮汹涌……泰晤士报记者特著评论，誉之为新中国之歌曲，谓其艺术造诣之深，直可并驾欧美。”他亦道出了出版歌集的初衷，“夏团长浸浴于群众热情鼓舞中，欣然将其歌谱，编订成集，交付南侨总会印行……合唱团只有二十八人耳，乃初到星洲，歌声一出，即轰动全南洋。今更以歌集编行，文字传播。人人唱之，人人能作武汉合唱团之歌声，人人亦能为武汉合唱团之团员。”<sup>⑱</sup>

有了在新加坡筹赈演出的基础，带着《民族呼声》歌集的48首歌曲，在南侨总会的统筹下，武汉合唱团从新加坡出发，一路向北，先后奔赴马来亚所属的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彭亨、霹雳、檳城、吉打、玻璃市等地，<sup>⑲</sup>又

<sup>⑬</sup>《陈嘉庚氏在武汉合唱团演唱开始的致词》（1939年2月26日《南洋商报》），叶奇思：《赤子丹心》，第207页。

<sup>⑭</sup>《球迷五千余人昨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欣赏合唱团球艺》（1939年2月9日《南洋商报》），叶奇思：《赤子丹心》，第172页。

<sup>⑮</sup>星华筹赈会是陈嘉庚于1937年10月在新加坡华侨中发起成立的一个爱国团体，原名“星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1938年10月该会扩大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为南洋华侨募款救助祖国筹赈总机关。

<sup>⑯</sup>《巴得力轮爱国游客拥挤》（1939年2月21日《南洋商报》），叶奇思：《赤子丹心》，第203页。

<sup>⑰</sup>戴鹏海、向延生两位先生认为，此间最早在境外出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是于1939年秋由李抱忱、李惟宁等编辑的《China Patriots Sing》（分别在香港及印度加尔各答出版，仅收入了14首抗战歌曲）。详见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有不得不说的话题》，《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第78页；向延生：《李抱忱与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49页。

<sup>⑱</sup>《民族呼声歌集》“序”，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39年4月7日印行。

<sup>⑲</sup>1909—1957年，马来亚为英国殖民时期（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其间的行政区划为：1、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檳城）；2、马来联邦（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3、马来属邦（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1948年，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等合并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沙拉越、沙巴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

开展了为期一年演赈活动。

### 三、在马来亚各地的演赈活动

在柔佛,合唱团于51天内演出39场<sup>②</sup>。合唱团进入柔佛后,《南洋商报》有追踪新闻报道:在新山皇宫戏院的3场演出中,“每曲告终,掌声频响,其紧张之场面,不亚于星加坡每次演出之情形”。以“周保灵女士之《长城谣》、《巾帼英雄》及江心美女士之《松花江上》,最获好评”。4月21日晚在大笨珍演唱,“继着抗战之歌响彻云霄,全场观众无疑身在战场……《歌八百壮士》之澎湃处如万马奔腾,令满场观众悠悠悲喜”。武汉合唱团在峇株巴辖第二晚演唱时,“合唱团诸君演唱精神,却愈形热烈……唱到悲惨处,观众中不少留下同情之泪,激昂处则又全场即其激越的浪潮”。在柔佛各地演出时,当地侨团组织除了向合唱团赠锦旗外,有的还献以花篮,合唱团遂将获赠花篮当场拍卖,所得收入概充赈款。

在马六甲,合唱团于23天内演出17场。在马六甲卡必多大戏院,合唱团首晚演出便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歌咏开始,其悲壮吼声,溢于全场,每歌一曲,掌声如雷动,唱至《保家乡》时并由夏之秋团长指导在场观众合唱”。至第二晚,“歌声激昂,有如万马奔腾,令人悲伤、感奋。尤以江心美女士、周保灵女士独唱大受观众赞叹‘再来,再来’的呼声,配合着紧张的气氛”。6月17日下午,武汉合唱团与马六甲三十八团体举行联合座谈会,讨论促进马六甲歌咏戏剧运动方案,主席何保仁说:“武汉合唱团来甲之后,逐渐引起侨众注意歌咏,如抗战到底、认清敌人、保家乡、松花江上、长城谣之歌声,天天可以听到,本席相信,此后歌咏必能在古城掀起。”合唱团在马六甲演出期间,先后与当地音乐社团有了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如,在合唱团于5月30日下午到达马六甲时,马六甲筹赈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茶会,并请晨钟铜乐队

现场奏乐”。6月1日演出时,“有侨生月明音乐队到场助兴”。在6月3日在野新、4日在万里望的2场演出中,又有“明星慈善铜乐队随之奏乐助兴”。6月5日在马六甲西湖戏院演出时,再有“侨生组织的亲爱音乐团奏乐”。6月16日在淡边的演出,有“商会音乐队到场奏救亡歌曲”。6月22日的演出,更是运用“武汉合唱团与侨生联合举办音乐会”的形式进行。<sup>③</sup>

在森美兰,合唱团于27天内演出18场。合唱团到森美兰后,先在芙蓉连演4晚,其最后一晚,“到场观众达三千余人,其中有西人和日本人等”,“当李杰女士独唱《告日本大众》歌词,全场空气极为紧张,并由陈仁炳博士用英语向观众解释歌词内容,中、西、日观众大受感动,唱《卖花词》时亦然”。其中,在芙蓉西人俱乐部的演出,是专为招待外籍人士而举行的,参加者有“森美兰参政司及华民护卫司,以及英籍军政领袖及眷属,英商界人士前来观看,侨领黄益堂等到场相陪”。演唱开始前,“由团长夏之秋用英语报告各节目,计有抗敌歌,满江红,旗正飘飘,焦土抗战,抗战到底,告日本大众,安全土,莫做汉奸,长城谣,打走敌人等”,继而由总领队陈仁炳用英语演讲。之后,“继续演唱,周保灵女士独唱英文歌圣母颂等曲,拍掌不绝,后又合唱英文歌,最后仍用国语演唱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在芙蓉乔治王英校礼堂举行的演唱会,是应森美兰公会的邀请举行的,观众主要是侨生及印、英籍学生。<sup>④</sup>

在雪兰莪(含巴生),合唱团于80天内演出47场。<sup>⑤</sup>由于雪兰莪州地理上是沿马六甲海峡南北狭长地带,合唱团于8月9日至13日暂离雪兰莪赴巴生港梨嘉戏院演出4场,8月12日中午在巴生港举行游轮演唱会,专为在巴生港口短暂停留的南侨总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征募处主任刘牡丹等,以及即将归国服务的60余名机工而在在轮

<sup>②③④⑤</sup>叶奇思:《赤子丹心》,第268-369;372-414;468-579;372-414页内容整理而成。

船上进行的1次演出活动：“先由合唱团诸君分别独唱、继以合唱。夏团长则弹唱指挥，兼而为之，一时欢声笑语，如水如潮，腾溢脑际，汇聚于偶然。然而航旅知音，共鸣一室，亦快事也。最后由夏之秋团长召开音乐速成班，教导机工合唱‘保家乡’时，瞬间，背唱自如。合唱团诸君，原为送友而来，竟收宣传之效以归。”<sup>24</sup>

当合唱团抵达雪兰莪首府吉隆坡时，得到十余万侨众的夹道欢迎，雪华筹赈会主席李孝式“假座中华大会堂，举行盛大茶会欢迎”，会场“遍贴触目惊心、发人猛醒之标语、联语”。其中的一副对联：“武亿声宏，铁板钢琶增敌忾；汉风威烈，全团合唱壮山河”，起到十分形象的介绍武汉合唱团与营造救亡气氛之作用。在吉隆坡的首场演出中，主席李孝式在致辞中说：“武汉合唱团，系用崭新之歌曲、高超之艺术、悲壮之声音演唱……故到处能令会场气氛紧张，人心振奋，好像置身于敌国烽火，观见敌人残酷之行为，同胞流离之惨状，其感人实深。”7月30日下午，合唱团应邀专为招待外宾演出，在演唱歌八百壮士一歌时，“全场外宾，大为同情，一致要求再唱。独唱时以江心美、周保灵女士最受欢迎”。合唱团在吉隆坡各地演唱的歌曲更为集中，通常演唱20余首抗战歌曲，最后结束的曲目一般是《歌八百壮士》。10月4日，合唱团举办为吉隆坡华侨接生医院筹赈演出；10月6日下午赴巴都律英文学校演唱。10月8日下午，当时驻吉隆坡领事施绍曾假座大华饭店饯别武汉合唱团时，宾主百余人“全体演唱《保家乡》第一节。一时‘齐心去打敌人’的歌声，响彻云霄，洵一时盛会”<sup>25</sup>。

在彭亨，合唱团于29天内演出18场。武汉合唱团在彭亨各埠的演唱曲目“计十项，凡三十首”。在18场演出中，近半有外籍人士前来聆听，“歌声慷慨激越，外侨多为感动，每曲终，均报以热烈的掌声”，除用英语演讲之外，合唱团有时会加唱一二首英文歌曲。<sup>26</sup>

在霹雳，合唱团于88天内共演出50场。武汉合唱团在霹雳州的演唱歌曲基本上与彭亨相同。其中，1940年1月14日晚的演出，为霹雳华人接生医院筹款专场演出，在演唱曲目方面增加了一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歌》，尚有当地“青年侨生、小提琴家黄永豪的演赈助兴”。2月1日晚，霹雳筹赈会假座太平埠福建会馆饯别合唱团，最后一项程序为全场合唱《保家乡》，“歌声激昂，响彻云霄”<sup>27</sup>。

在槟城，合唱团于15天内演出10场。武汉合唱团在槟城演出期间，其演唱曲目编定为《大家一条心》《共赴国难》《出发》《女青年战歌》《女子军人进行曲》《杀敌歌》《打杀汉奸》《心头恨》《征兵歌》《北风起》《流亡三部曲》《思乡》《归不得故乡》《保家乡》《送郎上前线》《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歌》《送寒衣予前方将士》《青天白日满地红》等18首。<sup>28</sup>

在吉打，合唱团于15天内共演出10场。3月4日至7日，合唱团赴玻璃市演出4场之后，尚有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筹赈会邀请合唱团前往演唱，但由于未获当地政府批准而作罢。合唱团一行25人遂由玻璃市返槟城，准备取道新加坡乘轮归国。<sup>29</sup>

在南洋演赈期间，武汉合唱团共举行266场演出，考虑到在欢迎仪式及其他场合的演唱活动，其演唱场次估计当在280场以上。其正式演唱的歌曲达49首，如果考虑到临时加唱曲目，保守估计当在50首以上。从演出场次，及曲目广泛程度来看，武汉合唱团此间的演唱活动，堪为我国合唱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 四、武汉合唱团南洋演赈的终止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武汉合唱团在此间受

<sup>24</sup> 《刘牡丹及〈南洋商报〉特派员抵巴生》（1939年8月11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515页。

<sup>25</sup> 《施领事慰劳合唱团》（1939年10月8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579页。

<sup>26</sup><sup>27</sup><sup>28</sup><sup>29</sup> 同注<sup>20</sup>，第582-617；582-617；704-724；704-724页内容整理而成。

到许多赞誉与嘉许的同时,也遭遇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困扰。使得原来怀着雄心勃勃活动计划的武汉合唱团,在苦心孤诣地坚持一年半之久后,面临各种困难而草草收场。

当合唱团先遣6人于1938年11月24日达到新加坡时,副团长黄椒衍便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我们所选的唱曲,可以代表中国抗战期间所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将它介绍到海外,使得友邦人士对于中国艺术有一良好认识。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所负的使命,绝非几首歌曲所能道尽。”“我们的艺术也许不是很能使人满意,我们将用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精神、热血、眼泪做我们的布景。”“若在南洋方面成绩圆满,再向欧美方面前进,路线临时决定。”<sup>⑩</sup>为了尽快展开工作,黄椒衍等于11月25日晚“谒见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恳予代为主持该团在星表演筹赈事宜”。26日,他们又分别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陈振贤、林庆年二氏,暨星洲日报社董事长胡文虎先生,报告该团南来之任务及请予以指导”<sup>⑪</sup>。

11月28日,新加坡38个侨团学校联合组成“星华各侨团欢迎武汉合唱团筹备委员会”,推举星华筹赈会为欢迎会主席,以便筹备合唱团在新加坡的演出事宜。但星华筹赈会却表示“不便担当”,筹备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以“另行设法”。<sup>⑫</sup>直到在新加坡的试演之前,星华筹赈会才表示:“为了便利该团演赈工作的进行,星华筹赈会特为举办一切。”在星华筹赈会的策划下,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演出得以顺利展开,而马来亚各地筹赈会闻风而动,纷邀武汉合唱团前往演唱。

合唱团深入马来亚各地后,随着演出场地的频繁更换,加之水土不服,团员出现生病等意外时有发生。如,1939年2月12日,星华筹赈会考虑到“武汉合唱团连日在星公演,备极忙碌……该团特乘休息之便,于上午八时,分乘汽车数量,前往参观柔佛大水池及该地吾侨实业建设机关”。不料途中一车倾翻,团员索景章、

陈久芳、王南溪等5人皆轻伤。以致在3月13日晚的演出中,“歌曲节目屡有更换,戏剧、原拟换演《人性》,嗣以该剧主角索景章女士因赴柔佛参观车祸受伤,故昨晚之剧,仍以《逃难到星洲》演出”<sup>⑬</sup>。12月22日晚,合唱团在霹靂州布先演出时,因该团“三团员,喉痛未愈,不能出席”,团长夏之秋首次上演独唱节目。至怡宝,副团长黄椒衍向外界称:“同人中又有数位因劳顿过度而染疾,然该团早已抱定决心,故不会影响工作。且团员屡带病登台,每人体重较未出国之前,俱减轻多磅。”<sup>⑭</sup>进入槟城后,又有3位团员因事先行归国,作为团长的夏之秋,为填补团员减少而造成的节目空缺,多次充任独唱。

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奸细、汉奸在南洋的活动趋于频繁,以及民国政府外交方面的不力,也给武汉合唱团在后续的演赈活动带来了重重阻力。合唱团在新加坡试演时,陈嘉庚曾在致辞中说:“日寇则在香港不惜巨资利用汉奸宣传,甚形活动……其目的则在阻碍吾侨之筹赈,及摧毁抵货之运动。”合唱团在星马各地的演出中,常有日本观众混迹其间。据夏之秋先生回忆,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出初期,就有日本领事曾到总督府抗议:“你们为什么允许中国这样的抗日团体到新加坡来?”新加坡英人总督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派同样性质的团体来新加坡演出。”这样,日本领事才自讨没趣地回去了。<sup>⑮</sup>但后来,英殖民地政府当局

<sup>⑩</sup>《武汉合唱团六人抵星》(193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36页。

<sup>⑪</sup>《武汉合唱团明晚举行试演》(1938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46页。

<sup>⑫</sup>《武汉合唱团那女团员十九人今日晨抵星》(1938年12月14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45页。

<sup>⑬</sup>《武汉合唱团在天福宫演唱第五晚》(1939年3月14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234页。

<sup>⑭</sup>《各界侨胞纷纷慰劳合唱团》(1939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637页。

<sup>⑮</sup>夏之秋:《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为抗战募捐演出二三事》,载陈先柄:《夏之秋纪念集》,中央音乐学院1994年特刊,第89页。

对武汉合唱团在各地演出，往往也会列出各种限制条件。1940年2月2日，在合唱团抵达槟城的当天，有数千人华侨聚集码头欢迎合唱团，“因与警察发生冲突，侨胞五人被捕。群众前往包围警察局，结果我侨二十余人受伤，此事不久即平息”。当时政府驻槟城黄领事，在之后的欢迎仪式上向侨众喊话，“吾侨为争取友邦更大的同情与援助，必须与当地政府合作，遵守当地法律，对其他民族亦应益加亲善”<sup>③6</sup>。在武汉合唱团演赈活动上，中日双方的外交角力，由此可见一斑。

接着，吉兰丹筹赈会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合唱团前往演唱，但未获批准，丁加奴州筹赈会的类似请求亦未获批准，合唱团另寻出马来亚到英属婆罗洲或荷属东印度各部，亦未获准入境。这样，合唱团在玻璃市演唱之后，于1940年3月10日一行22人返回槟城。4月23日，武汉合唱团所有团员由新加坡先后归国。至1940年5月13日，大部分团员由总领队陈仁炳率领抵达昆明，合唱团结束了在南洋的巡演。<sup>③7</sup>

武汉合唱团南洋演赈活动，受发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主义高扬时代，而“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sup>③8</sup>。此时，新音乐运动在我国已经历了近50年的演进，音乐教育的发展为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作曲家、歌唱者与聆听者。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国进入全民族抗战，极大

地激发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由此创作出一批浓郁战斗气息的抗战歌曲，而武汉合唱团在南洋演出中演唱的歌曲，当为这一批抗战歌曲中典范之作。

“北望宗邦，满目苍夷；音容过处，黄魂为振”，马来亚华文报刊对合唱团演出的追踪报道与渲染，持续地激起全马华侨的爱国意识，使得在合唱团的演出中，全马华侨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马驮千斤，蚁负一粒”，踊跃捐输，甚至毁家纾难，造就了空前的筹赈成绩。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侨总会及各地筹赈分会对于合唱团的支持，也是合唱团取得圆满成绩的助力之一。马来亚各地侨领、侨贤，除慷慨捐输外，还带领同侨“义务地建筑戏台，报效电气，土木运输等”，侨胞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合唱团激动人心的演出，更是全体侨胞的空前团结，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的危险情势面前，所具有的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责任编辑：姚 岚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9ZD14）的阶段成果。

<sup>③6</sup>《合唱团由太平抵檳碼頭》（1940年2月3日《南洋商报》），载叶奇思：《赤子丹心》，第704页。

<sup>③7</sup>《武汉合唱团归国抵昆即行赴渝》，《新华日报》，1940年5月13日，第2版。

<sup>③8</sup>王续添：《音乐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0页。